

话说 陕西

隋唐五代卷

公元581年至公元960年

唐月照关河

陕西史册上辉煌靓丽的篇章

● 学术顾问 > 张岂之 石兴邦 ● 总主编 > 黄留珠

贾志刚 主编

西北大学出版社



-83

话说陕西

[4]

隋唐五代卷

公元581年至公元960年

唐月照关河

陕西史册上辉煌靓丽的篇章

贾志刚 主编



西北大学出版社

K2P4.1

H859

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月照关河：陕西史册上辉煌靓丽的篇章：隋唐五代卷 / 贾志刚主编.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9.12

(话说陕西)

ISBN 978-7-5604-2734-8

I. 唐… II. 贾… III. 陕西省—地方史—隋代~五代十国时期—通俗读物 IV. K294.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30684号

《话说陕西》【4】隋唐五代卷

唐月照关河：陕西史册上辉煌靓丽的篇章

主 编：贾志刚

撰 稿：贾志刚 陈文丽 成舒宇 邓 志 邱贤文 陈雨梅 刘彦梅 贾荣珍 刘翠芳
方东明 季明稳 张迎晓

辅文作者：雷 钰(世界大事记、中国大事记) 刘合心(图说文字)

出版发行：西北大学出版社

销售电话：029-88302590

地 址：西安市太白北路229号(邮编：710069)

网 址：<http://press.nwu.edu.cn>

经 销：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毫米×1089毫米 1/16

印 张：16.25

版 次：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04-2734-8

定 价：63.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隋唐五代卷

公元581年至公元960年

陕

话说 陕西

隋唐五代卷

总顾问

胡 悦 郑小明

学术顾问

张岂之 石兴邦

编委会主任

薛保勤

编委员会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云祥 马 来 方光华 成立笠
刘宝才 刘学智 朱恪孝 齐雅丽
李云峰 李映方 李 浩 李颖科
吴丰宽 吴敏霞 肖云儒 陆柯仑
张书玲 张宝通 杨陆俊 林乐昌
周天游 岳少峰 赵世超 赵 荣
赵馥洁 郭 杰 高彦平 阎 琦
黄留珠 董旭阳 霍松林 薛保勤

总策划

董旭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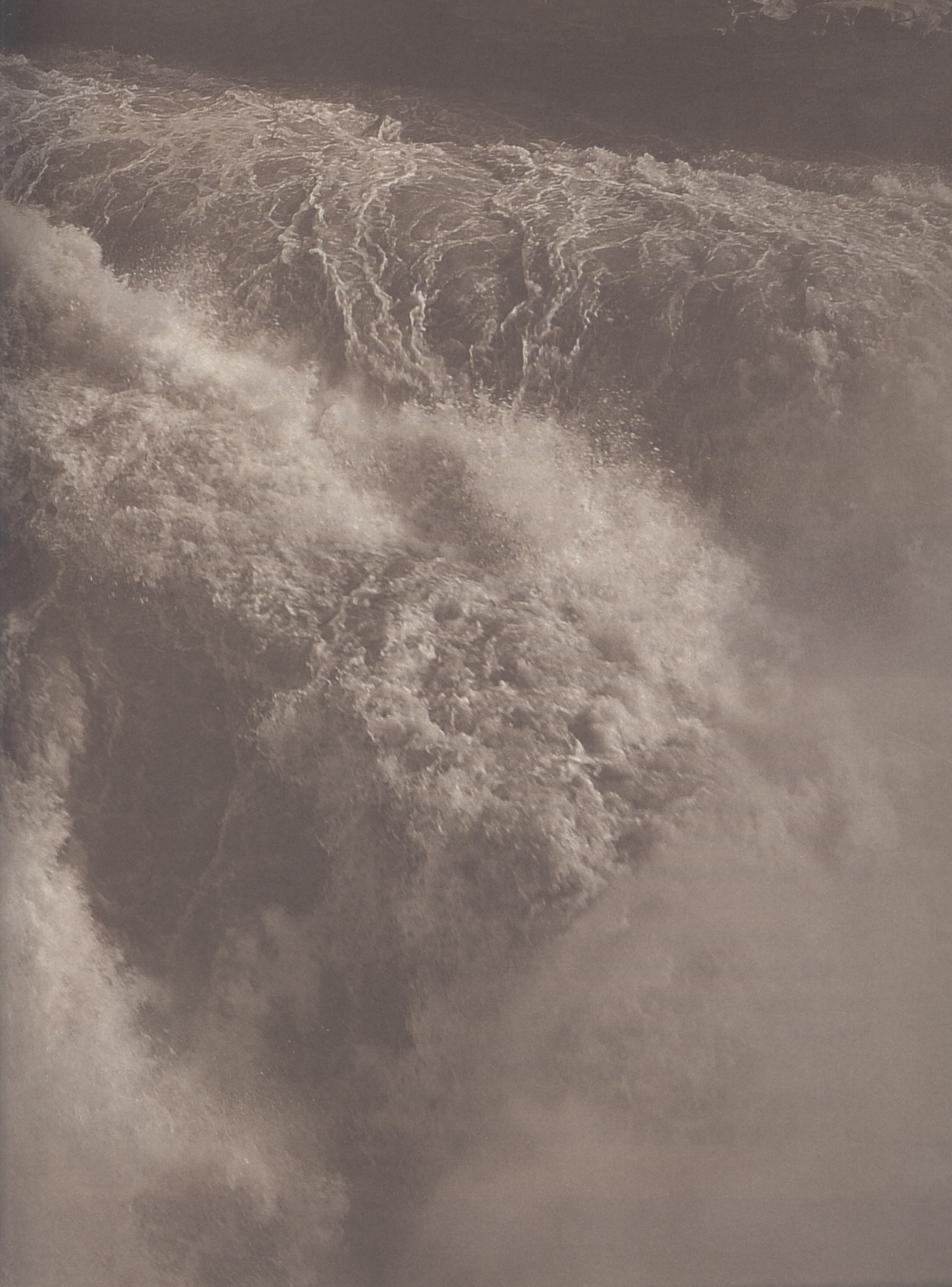
总主编

黄留珠

本卷审定

阎 琦 杜文玉





话说陕西



唐月照关河



话说陕西

总序

张岂之

地处中国腹地、黄河中游的陕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和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早在115万年以前，这里就已经生活有远古人类。从蓝田猿人到荔人，再到陕北的河套人以及沙苑人，显现了陕西境内北方直立猿人向智人发展的轨迹。以半坡、姜寨、北首岭为代表的仰韶文化遗存，以客省庄、米家崖为代表的龙山文化遗存，皆典型地反映了中华先民在农业、畜牧业、手工业、渔业以及初具雏形的文字、绘画、雕塑等方面的文明程度。

大家公认的中华民族始祖炎、黄二帝，相传其部族就崛起于渭水中游和陕北高原。位于黄陵县的黄帝陵，自西汉以来，历代供奉和祭祀不绝。认同黄帝，就意味着认同中华。陕西黄帝陵，已升华为亿万中国人心中民族与历史的象征，成为全世界华人共有的民族精神家园。

陕西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中心舞台之一。周、秦、汉、唐这样几个声威远播、最具影响力的王朝均建都于此，从而留下了“长安自古帝王州”的赞誉诗句。其所放射出的中华文化光辉，代表了当时人类所企及的文明高峰，也谱写了陕西历史文化的辉煌篇章。以古都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连结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促进了两大文明的交流与交融，同时也把陕西这片富饶的黄土地推向了世界，使之在人类文明交往的史册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陕西还是诸多“革命”的策源地或圣地。古有“汤武革命”之说，武王伐纣，即起自陕西；唐代黄巢农民革命军的大齐政权，诞生在长安；明末李自成农民革命军的大顺政权，亦定鼎于长安。1911年10月，武昌爆发辛亥革命，陕西是最先响应并实现光复的省份之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红色革命圣地延安奋斗13年（1935—1947），为抗日战争胜利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演奏出陕西革命交响乐曲中最雄伟的乐章。

陕西地灵人杰。这里不仅有壮丽的山川、肥沃的土地、丰富的资源，而且产生了雄才大略、明德达人的圣君贤相，运筹帷幄、叱咤风云的谋臣猛将，巧夺天工、卓尔不群的能工巧匠，才华横溢、文章千古的文人学者以及忧国忧民、视死如归的仁人志士。他们为中华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业绩与名字，同陕西历史、也同整个中国历史永远连在一起。

光辉历史在陕西留下的丰厚文化遗产，同样为世人所瞩目。陕西文物遍地，名胜古迹星罗棋布。特别是秦始皇陵兵马俑、汉阳陵裸体彩俑、唐法门寺地





宫一类超级文物，更被誉为奇迹。此外，还有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秦腔、眉户、商洛花鼓、集贤古乐、华阴老腔、华县皮影、农家剪纸、安塞腰鼓、陕北信天游等。大凡知道或亲自到过陕西的人，不论其国籍、种族、肤色如何，可以说毫无例外地都会被这里的历史文化遗产所折服所倾倒。

由于陕西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所以编写专门的陕西历史读物，就成为一种客观的现实需要。人们高兴地看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陕西学界和出版界相互配合、共同努力，已经陆续推出了一批颇有影响的关于陕西历史的图书，如由著名学者、曾任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及陕西省社科院领导的郭琦先生主编的《陕西五千年》，由郭琦和著名史学家史念海及我本人共同主编的多卷本《陕西通史》等。这些著述，在宣传陕西、介绍陕西历史文化，以及推进陕西文化建设等方面，都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不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进入21世纪后面临的各种挑战，特别是面对近年来出现的学术大众化的文化走势，新编一部品位高尚、立意新颖，科学性、趣味性、观赏性俱佳的陕西历史读物的任务，又迫切地提到议事日程之上。为此，经陕西省有关领导部门的周密策划，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具体组织编写出版，奉献给大家这套八卷本的《话说陕西》。

这套书精选陕西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代表性事件及重大成就，以故事形式为主，“珍珠”串线，“话说”陕西。同时，配置大量以陕西出土文物为主的图片，凸现图文并茂的特点，“图说”陕西。另外，在“话说”“图说”的不同节点上，穿插整个中国与世界历史文化背景及相关知识链接。如此故事、图片、知识链接三者有机结合，相互补充，相互佐证，相得益彰，形象直观地反映陕西上起远古、下至现当代的社会发展与进步，文明传承与演进。希望这套图文并茂、雅俗共赏的陕西历史图书，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为实现把陕西建成文化强省的战略目标，尽一份绵薄之力。

承西北大学出版社和《话说陕西》编委会的盛情，邀请我与石兴邦先生担任该书的学术顾问。如是，我与这部书就有了直接的关系。也许因我曾担任西北大学出版社第一任社长的缘故，他们又请我为该书写篇序言，于是写了上面一些话，供读者朋友们参考。我希望读者朋友们能够喜欢这套书。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一)

话说陕西

总论

黄留珠

“陕西”作为地区概念，其出现可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西周初期。据《春秋公羊传》的说法，周天子之下设有三位“相”（即当国之正卿），称作“三公”。其中，“一相处于内”，另外两相周公与召公则分区而“总诸侯”。

“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这里的“陕”，通常认为指的是战国时的陕陌，汉以后的陕县，即今河南陕县。也有说法认为“陕”当作“郑”，指周王城所在地郑郛（音jiá rǔ），即今河南洛阳西北。如此就产生了“陕东”与“陕西”的地理区分。陕东为周公负责的“总诸侯”区域，陕西为召公负责的“总诸侯”区域。研究者或认为，这时使用的“陕东”“陕西”概念，基本上与战国秦汉时期所谓的“山东”“山西”（“山”即崤山），或曰“关东”“关西”（“关”即函谷关）概念近似。由此可知，最初陕西概念所包含的地域范围要比今天的陕西省大多了。

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在其所著的《日知录》卷三十一列有“陕西”条，专论陕西名称的由来及所指区域的演变。其中，有两句带有总结意味的话颇值得注意：一是说“晋时以关中为陕西”，再是说“后人遂以潼关以西通谓陕西”。

关于第一句话，从其后文可知，这里的“晋时”，当指西晋。而如果进一步从顾炎武举证的《晋书·宣帝纪》有关材料来看，三国时期魏青龙四年（326），司马懿在长安屯守备蜀，获白鹿贡献给朝廷，被魏明帝命之曰“今君受陕西之命，有白鹿之献”，似乎早在曹魏时，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已被称作“陕西”，而不是后来到西晋时期才将关中称为陕西。关于第二句话，从其前文列举《旧唐书》诸记载可知，这里的“后人”所指应是唐代以后的人，至于具体“后”到何时，似并未交代明白。不过这里可以确认的一点是，以潼关为东界的陕西，显然与周代召公所主的陕西已相去甚远，而与今天陕西概念的东界倒是基本相吻合了。

《宋史·地理志》载：“至道三年（997），分天下为十五路。”其中置设陕西路，治所在京兆府（今陕西西安），辖境约当今陕西和宁夏的长城以南、秦岭以北及山西西南部、河南西北部、甘肃东南部地区。这种格局与西周召公所主之陕西大体近似。不过，这却是陕西首次以国家统一、完整划分的





行政区之一的面目登台亮相，意义重大。一些权威性工具书如《辞源》称：

“陕西之名始此。”一般论者也多沿用《辞源》的说法。其实，《辞源》之说并不严谨。这里，关键点一是没能区分“地区”与“政区”两个不同的概念，二是没有把部分性政区名与全国性政区名区别开来。历史事实应该是，陕西作为地区之名，西周时早已有之；作为部分性政区之名，首见于唐代以陕西为方镇名（节度使辖地之名），即上元元年（760），改陕虢节度使为陕西节度使；作为全国性政区名称，则始自北宋至道年间。

＞ 北宋熙宁五年（1072），将陕西路分为永兴军、秦凤两路，元丰元年（1078）复并为陕西路；八年（1085）又分为永兴军与秦凤两路。不过习惯上仍称此两路为陕西路。其后元、明、清三代，均以陕西作为全国性行政区划名称之一。元置称陕西行中书省（简称陕西行省），明置称陕西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使司，又称藩司，习惯上仍称行省或省），清置称陕西省，并且此名称一直延用至今。这里，需要指出的有两点：其一，元、明两代陕西的辖区较今陕西所辖要大得多，而清代陕西省境与今陕西省境大体相若，换言之，即是说今陕西的省界基本上为清代所奠定。其二，自元代开始，陕西政区的东界均基本上以潼关为准沿南北方向划线，前举《日知录》“陕西”条“后人遂以潼关以西通谓陕西”句中之“后人”，确切地讲，当指元代以后之人。

＞ 今陕西省地处我国中部偏东靠北地区，总面积20.58万平方公里。全省地域南北长（延伸达800公里以上）、东西窄（最狭处仅170公里），形状宛如一跪射之武士；地势南北高、中间低，从北到南依次分为陕北高原、关中平原（所谓八百里秦川）、秦巴山地三大区域。其东邻山西、河南两省，西连宁夏回族自治区与甘肃省，南抵四川省、重庆市、湖北省，北接内蒙古自治区，为连接我国东、中部地区和西北、西南地区的枢纽之地。我国大地原点就定在陕西泾阳县的永乐镇。

（二）

- ＞ 如果要问陕西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人们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她灿烂辉煌而又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
- ＞ 20世纪60年代，在蓝田县灞水之滨的公王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距今115万年



的“蓝田猿人”，拉开了迄今可知的陕西历史帷幕。由蓝田人与距今18万—23万年的大荔人、距今3.7万—5万年的陕北河套人、距今1万年的沙苑人，以及以半坡、姜寨、北首岭遗址为代表的仰韶文化，以客省庄、米家崖遗址为代表的龙山文化等，给我们勾勒出了一条清晰演进的陕西原始社会的基本历史线索。按学术界较普遍的认识，仰韶文化晚期或龙山文化早期，大体便与传说的炎黄时代衔接上了。

被公认为中华民族始祖的炎帝、黄帝，在陕西历史上都留下了巨大的印迹。炎、黄部族就崛起于渭水中游和陕北高原之上。炎黄时代是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各方面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随后而兴的夏、商、周三代文明，其根基正是炎黄时代所奠立的。

夏代的势力是否到达陕西？从禹凿龙门的传说，以及有扈氏与夏启战于甘（今陕西户县境）一事，似乎可以窥见某些蛛丝马迹。而考古发现的商州东龙山遗址，研究者一般认为即夏文化遗存。有关殷商势力在陕西的情况，从西安老牛坡遗址和城固宝山遗址可知，殷商势力不仅发展到关中，而且还延伸到陕南地区。

发迹于陕西的周人所建立的周王朝，把陕西历史推向一个发展的新高峰。位于今西安市西的丰镐，作为王朝的京师，充分发挥了其政治中心的作用。周公制礼作乐，并以这种礼乐制度规范整个社会，从而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日后孔子创立儒学，主要继承发扬的就是周公的这套礼乐文明。

秦人源自何方，至今学界仍存争议。不过，自襄公始国之后，秦人在陕西这块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却是不争的事实。穆公的争霸，献公、孝公的求强，商鞅的变法，始皇的统一，这一切将陕西历史推向第二个发展的高峰。秦创建的以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与郡县制为特征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创立的多民族大一统国家模式，其影响之巨大、之深远，直到今天仍是每一个中国人能够深切感受到的。

继秦而立的西汉，以其“匹夫而有天下”及“布衣卿相之局”的政治特色，被论者惊呼为一个“大变局”时代。以京师长安为中心的古代陕西，正是这一变局的原生之地。从汉初崇尚黄老之学、开创文景之治，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兴功作业，再到昭宣中兴，以至王莽改制，激荡的大汉雄风使陕西历史迈入其第三个发展高峰。以西域“凿空”为标志，丝绸之路沟通了东西两大





文明；以“尊儒”为旗号，“霸王道杂之”的汉政成为后世永则的范式；而汉族、汉人、汉字、汉语等，也都缘汉帝国得其名。

＞ 东汉以降，陕西失去政治中心的地位，但因长安为皇室先祖陵寝所在地，所以把这里与京师洛阳所在地同辖于司隶校尉，属京畿范围，以示重视。魏晋南北朝时期，前赵、前秦、后秦、大夏、西魏、北周等分裂时期的王朝，先后在陕西建都，陕西历史在民族融合的大潮中继续前进。

＞ 隋唐时期，陕西历史迎来了第四个发展的高峰。特别是唐代，陕西的历史发展则达到了巅峰。“华”“夷”如一，盛世之治；崇文好诗，文明中心。万民崇仰、万邦向往的京师长安，尽显数百年民族大融合结出的汇通硕果，满载经济文化交流国际大都会的历史责任。博大包容、开放进取的大唐气象，是中国历史的骄傲，更是陕西历史的骄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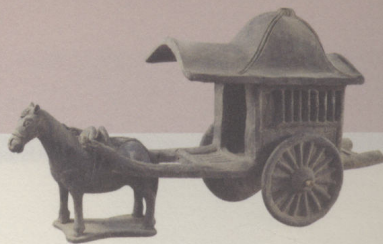
＞ 五代以及宋、元、明、清时期，帝国中心东移、北迁，陕西虽然昔日辉煌不再，但以其地理区位优势，成为西北重镇，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如此一类陕西人发出的豪壮声音，继绝起衰，振聋发聩。陕西历史在继续发展，只不过场面远没有以前那么宏大罢了。

＞ 陕西以最先响应辛亥革命、实现光复的形象迈入民国时期。20世纪30年代，在民族危亡之际，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它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避免了亡国之祸。中国共产党人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地区的卓绝奋斗，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雄伟壮丽的篇章，亦为陕西历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 新中国建立后，陕西历史开始了全新的时代。陕西作为西北大区最发达的省份，成为大西北发展的龙头。改革开放以来，昔日丝路起点的陕西，又作为整个欧亚大陆桥的东方桥头堡发挥巨大的作用，在西部大开发中，具有重要地位。今天，勤劳智慧的陕西人民，锐意创新，改革进取，正在努力为把陕西建设成为经济、文化强省而拼搏奋斗。一个现代、绿色、开放、和谐、人文昌盛、环境优美、蕴含巨大发展潜力、充满活力和机遇的新陕西，已经展现在人们面前。

＞ 综观整个陕西历史的发展，明显可以看出如下一些特点：

＞ 一曰“悠久”。陕西原始社会的历史，可追溯到115万年以前；其文明史，亦



可追溯到五六千年前的炎黄时代。而这些，皆有可靠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证实，决非生拉硬扯、胡编乱造式的“作假”。

二曰“辉煌”。众所周知，周、秦、汉、唐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演绎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而这几个辉煌的王朝，又均建都于陕西，以陕西作为其统治中心。所以这些王朝的辉煌，也势必为陕西所享有，衍为陕西历史的辉煌。无论是周的礼乐文明，秦汉的制度文化，还是唐帝国博大开放的气势、诗园艺苑的风韵，皆出自陕西而传之全国，从而成就了令世人引以为自豪的盛世辉煌。

三曰“融汇”。这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民族的融合。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不断融合，显然是其发展的主流。崛起于陕西的周人灭商，里面就含有商、周两族的融合。秦人自西而东发展，实际就是不断征服、融合陕甘境内诸多戎狄少数民族的过程，至始皇统一，则建立了多民族大一统的帝国。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更是规模空前，而陕西恰好就是这场大融合的中心舞台。此后建唐的李氏一族之所以崛起，在陈寅恪看来，“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后，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从某种意义上讲，盛唐之出现，正是此前民族大融合结出的汇通之果，再后的辽、夏、金、元、清，莫不可作如是观。二是文化的汇融。这包括国内、国外两个方面。就国内而言，主要指各地区的文化交汇。如秦汉时期，帝国政府大量迁徙关东豪富充实关中，造成关东、关中地区的文化交汇就很具典型性。史称故秦地，也就是陕西，“五方杂错，风俗不纯”，实际正是这种“四方辐凑并至而会”的文化融汇的结果。与国外的文化交汇则以佛教文化的中国化最具代表性。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即被加以中国化的改造，这实际上也就是中外文化的一种融汇。唐时长安为佛教的一大中心，佛教中国化的程度也被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其标志就是佛教宗派的创立。在众多的佛家法派中，影响较大者计八派，而其中六派都创立于长安。此外，传入唐京畿地区的还有摩尼教（明教）、袄（音xiān）教（拜火教）、伊斯兰教、景教（基督教支派）等外来宗教。它们在不同程度上也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交汇交融。故以长安为中心的陕西关中一带，事实上成为中外文化融汇的圣地。当然，中外文化交汇并不只限于宗教一途，其他如国外派来的遣唐使、留学生等，也具有这样的功能。现藏于西北大学博



物馆的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墓志铭，便是中日文化交流交汇最有力的证据。总之，陕西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文化融汇，乃常态的客观存在。惟其如此，才造就了周、秦、汉、唐四大高峰期长达千余年陕西历史那种博大包容、恢弘深邃的气势和积极向上、开放进取的风貌。这既是陕西历史的亮点，也是其显著特点。

＞ 以上所述，未必能将陕西历史的特点悉数囊括。不过，概括起来，陕西历史在整个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可做如下形象的说明：如果把中国历史比作一棵大树，那么，陕西历史就是这棵大树的根；如果把中国历史比作一条长河，那么，陕西历史就是这条长河的源。总括起来讲：陕西历史是中国历史的根源。当然，大树的根不会只有一支；大河的源，也不可能只有一条。但根中必有主根，源中亦必有主源。陕西历史正是那中国历史大树的主根，中国历史长河的主源。

＞ 进一步说，构成中国历史最根本性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等精神文化要素，如礼乐文明、集权式政治制度、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形态、小农经济体制、“霸王道杂之”的治国理念、民族融合、文化汇融、丝路交流，乃至绵延不断的以纪传体为主的历史纪录等等，或发端自陕西，或奠立于陕西，或完善于陕西。换言之，即是说中国历史的基本要素，大多是在陕西这块沃土上孕育出来的。

(三)

＞ 陕西是文化大省，而今正在向文化强省迈进。对陕西历史文化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并以通俗、活泼的形式，将其介绍给广大读者，是建设文化强省、增强文化软实力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为此，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新闻出版局的领导和指导下，西北大学出版社组织相关专家学者，编写了这部《话说陕西》——一部图文并茂的普及版陕西通史。希望这种努力对建设我们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出一点力，做一点事，尽一份心。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日于锵音阁





话说陕西

导言

贾志刚

公元581年，杨坚代周称帝，隋朝建立。隋开皇八年（588），隋文帝发动平陈战争，次年完成南北统一，结束了中国几个世纪的大分裂局面，隋都大兴城成为开皇之治的政治中心。李渊在隋末大乱中起兵太原，渡黄河攻入大兴城。武德元年（618），唐朝建邦立国，从此李唐王朝再次以长安为都城，重新经营帝业，君臣励精图治，发奋图强，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相继出现，社会经济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

隋唐奉行修文德以来远方的外交政策，曾经与370多个蕃国通使往来。中外文化频繁交流的结果是外来文明无处不在，中原文化远距离传播。博大精深的隋唐文明曾经在东方文明中大放异彩，也有力地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高度发达的隋唐社会文明是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隋唐时代富有活力的政治制度，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绚丽多彩的时代文化，相对繁盛的社会经济，均成为支撑隋唐盛世气象的擎天之柱。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隋唐人以其勇于创新、敢于进取、明于通变而享有盛誉。首先，隋唐统治集团适应社会发展趋势改革传统政治制度，以三省六部制取代了秦汉以来的三公九卿制，后期使职差遣制又在三省六部制的框架中若隐若现，基本奠定赵宋以降的封建政治制度。其次，隋唐两朝对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和财政制度等也进行了改革，在变通中主动创新。均田制由确立到放弃，新的土地还授制度、占有制度的确立与展开，几乎与从租庸调制向两税法的过渡同步进行。再者，为了适应门阀士族向官僚政治的变化，隋唐在废除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后，设立科举制选贤任能，一大批文学之士脱颖而出，给官僚队伍注入无限活力。特别是科举制多为后世遵行，成为历朝历代的主要选官之法。还有，隋唐以两京为代表的城市建造取得巨大成就，同时，隋唐城市发展正处在由秦汉以来的城坊封闭向两宋以降的坊市制崩坏转型的关键时期，城市在布局和功能上都在发生变化，以政治军事功能为主的古代型坊市制崩溃，经济型、文化型、生活型城市在两宋以后逐渐显现其魅力，这种重要的变化也是肇端于隋唐时期。

长安城作为四方取则的京师之地，在隋唐辉煌灿烂的历史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唐长安城不仅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而且格局严整，“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白居易），坊市封闭配合着街陌纵横，冈原相间点缀着帝宫内苑。长安的文物制度不仅是唐朝各地仿效的标准，也影响到周





边地区，日本、新罗等地都不同程度地参照了长安模式。

- ＞ 隋唐长安城是政治家的乐园。不管是“忘己爱苍生”的帝王，还是时刻都想“致君尧舜上”的将相，甚至是“徒有羡鱼情”的处士，都能在长安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积极进取的社会风气，更培养出无数舍身报国的热血男儿，涌现出了难以数计的风流人物。他们中有出将入相、才兼文武的李靖，胸怀万里、练达边事的唐休璟，激浊扬清、嫉恶好善的王珪，处繁理剧、众务必举的戴胄，知无不为、孜孜奉国的房玄龄，以谏诤为心、臣道无隐的魏征，不满七尺、心雄万夫的李白等。统治者在长安太极宫中曾为宰相功臣修建了凌烟阁和功臣阁，以铭记他们的丰功伟绩，史官也在史馆中记下他们的生平事迹，历代民众还在心里为他们树立了永久的纪念丰碑。
- ＞ 隋唐长安也是外来文明的天堂。由于唐政府在对外政策上坚持“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传统，博大包容的唐朝遂成为异国他邦竞相交聘的天朝上国。于是，殊俗重译而至，远人不招自来，胡风胡俗如潮水般涌入，开放热情的长安人怀着昂扬的激情接纳着来自外蕃绝域的文化。一时间，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饌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妇人胡帽乘马，男子胡服骑射，胡风胡化成为社会风气。其时，以长安为中心，不仅建成国内交通网络，也开辟了多条对外通道，如沙漠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九姓参天可汗道等，大量奇珍异宝由此络绎而至，无数异域风情也纷至沓来。唐都长安变成举世瞩目、万国朝聘的世界性大都会。
- ＞ 隋唐长安又是一个艺术家的大舞台。隋唐帝国相对稳定统一，天下承平日久，社会财富得以长期积累，这些都为艺术活动营造了千载一遇的社会环境。长安作为人文荟萃的京城，具有各类艺术求之不得的广阔市场，无数技高一筹的艺术家脱颖而出。有丹青神化的阎立本，有吴带当风、曹衣出水的吴道子，有瘦硬清寒、神气充腴的欧阳询，有“体法自然归大道”的虞世南，有草书惊天地、泣鬼神的张颠素狂，有“似我者俗，学我者死”的李邕，有“一舞剑气动四方”的公孙大娘，更有如惊鸿飞燕般的柘枝舞、急转如风的胡旋舞、动感十足的胡腾舞等。喜歌善舞、能写会画的长安人生活在一个“满耳笙歌满眼花”的岁月里，欣赏着出神入化的书画杰作。北宋苏轼深有感触地说：“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

